

绿色竞争力正在重塑国际贸易规则

□ 王晓明

在经济全球化走向纵深的时代，国际贸易规则正经历着深刻变革。一些国家或国家集团通过制定新的制度和法案正在逐步推动这场变革。从欧盟推出的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电池法案、英国CBAM、航运碳减排等“气候贸易规则”，到英国、美国、加拿大、日本等G7成员国相继考虑和推出的“碳边境税”，这些举措均是将绿色发展理念和气候行动纳入到国际贸易规则里，进一步强调了气候和环境问题与经济贸易之间的联系，也反映了大国间经济与政治力量对比的转移以及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的响应。绿色低碳发展是全球经济贸易可持续发展探索的有效途径，以绿色低碳水平为特征绿色竞争力正在重塑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国际贸易规则。

绿色竞争力是指企业在环境保护的基础上，通过绿色管理和技术创新，提供环境友好的产品和服务，从而在市场上获得可持续竞争优势的能力。这一概念强调了经济效益与生态可持续性的结合，旨在推动企业和社会向更加绿色的方向发展。例如，一些企业积极研发和应用可再生能源技术，不仅降低了生产成本，还提高了产品的附加值，增强了市场竞争力。具备强大绿色竞争力的企业能够在国际市场中脱颖而出，赢得全球消费者青睐，同时也有利于降低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为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绿色竞争力重塑国际贸易规则有多方面原因。其一，全球气候变化的严峻形势迫使各国采取行动。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天气、海平面上升等问题，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巨大威胁。为了应对这一挑战，各国纷纷制定了严格的环保法规和减排目标，推动经济向绿色低碳转型。各国对气候变化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相关政策法规和立法调整幅度不断加大，也必然会对国际

贸易规则产生深远影响，促使企业和国家更加注重绿色竞争力的提升。其二，国际贸易市场的需求变化倒逼规则做出相应调整。主要体现在全球消费者对绿色环保产品的需求不断增长。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提高，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愿意选择环保、绿色、健康、可持续的产品。这种消费理念的转变，使得企业不得不加大对绿色技术的投入，提高产品的绿色含量，以满足市场需求。因此，在国际贸易中，具备绿色竞争力的产品更容易获得市场份额，从而推动国际贸易规则向更加绿色环保的方向发展。此外，传统国际贸易模式的不可持续性也使国际贸易规则发生变革。传统上，产品研发者和制造者更加注重制造成本和效率，而往往忽视环境成本。这种模式导致资源过度消耗和环境逐步恶化，已经无法适应全球范围内可持续发展要求。为了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国际贸易规则必须进行调整，鼓励企业采用绿色生产方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环境污染。值得一提的是，新兴国际贸易规则的不断出现，如碳关税等，也对绿色竞争力提出了更高要求。碳关税是一种基于碳排放的贸易措施，旨在通过对高碳排放产品征收关税，促使企业减少碳排放。这一规则的实施，将使得绿色竞争力成为企业参与国际贸易的重要门槛，进一步推动国际贸易规则绿色化转型。

通过提升绿色竞争力重塑国际贸易规则，既会给各国发展带来积极影响和有利机遇，也会使其面临一定的压力和挑战。随着绿色低碳发展的深入推进，绿色环保产品在国际市场中的备受青睐，各国会积极主动加强科技创新，加大绿色低碳技术的研发和投入，不断研发绿色环保、可持续产品，提升产品竞争力，有利于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绿色发展，从而更好地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在国际贸易中通

过低碳认证和贴上绿色标签的产品可以为企业赢得更多的市场信任和可持续的经济回报，进而不断提升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绿色市场份额，扩大其国际竞争优势。这种趋势也会加强各国、各地区的绿色贸易合作与交流，促进绿色贸易规则打造，加强绿色低碳技术创新，推动国际贸易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实现全球经济发展与环境安全的共赢。与此同时，国际贸易规则的转变意味着新的国际贸易壁垒的出现。融入了绿色低碳发展特征的国际贸易规则反映出国际贸易中日益凸显的绿色壁垒。这对众多发展中国家的竞争优势和贸易优势可能大幅削弱，进而影响国内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为避免更高的关税或达到绿色标准，企业可能需要投资于更环保的技术和原材料，或者进行额外的认证和检测，导致生产成本增加。这些成本最终可能会转嫁给消费者，影响产品的价格竞争力。此外，如果强制推行的统一标准过高，没有充分考虑各国的发展水平差异，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可能会加剧对高碳排放产品征收关税，促使企业减少碳排放。这一规则的实施，将使得绿色竞争力成为企业参与国际贸易的重要门槛，进一步推动国际贸易规则绿色化转型。

通过提升绿色竞争力重塑国际贸易规则，既会给各国发展带来积极影响和有利机遇，也会使其面临一定的压力和挑战。随着绿色低碳发展的深入推进，绿色环保产品在国际市场中的备受青睐，各国会积极主动加强科技创新，加大绿色低碳技术的研发和投入，不断研发绿色环保、可持续产品，提升产品竞争力，有利于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绿色发展，从而更好地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在国际贸易中通

励绿色发展的政策，例如通过设立专项基金、税收优惠、补贴政策等，激励企业进行绿色创新和技术改造。其次，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大力发展绿色低碳技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绿色发展。支持清洁能源、节能减排、资源循环利用等方面绿色技术的研发和推广，通过技术创新降低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提升产品竞争力，同时开发低碳、环保、可持续的新产品，满足国际市场对绿色产品的需求。此外，利用技术创新优化产业结构调整，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新能源、节能环保产业等绿色产业发展。最后，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增进绿色发展共识，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绿色化转型和国际贸易规则重塑进程。积极参与国际气候变化谈判和国际贸易规则制定，积极主动寻求多边合作，履行国际承诺，共同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国际贸易规则体系。加强国际绿色技术的交流与合作，促进先进的绿色技术和管理经验在各国之间的互鉴，为国际贸易注入新的增长动力，共同促进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和转型发展。

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与推进“碳中和”目标的背景下，以绿色低碳水平为特征绿色竞争力正在重塑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国际贸易规则。世界各国政府都应充分认识到这一趋势，积极采取措施提升企业的绿色竞争力，以适应和促进国际贸易规则的变革。只有这样，才能在经济全球化的激烈竞争中占据优势，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



区域国别学与国家战略是什么关系

□ 翟 崑 韩卓希

“区域国别学”于2022年9月正式成为“交叉学科”门类的一级学科。根据相关定义，区域国别学主要针对特定国家或者地区的人文、地理、政治、经济等进行全面深入研究，是多学科、跨学科、学科融合的综合领域。区域国别学与国家战略具有天然的契合性，二者相互关联、彼此支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助力。

区域国别学与国家战略“学用相生”。区域国别学作为交叉学科的重点任务是培养突破学科边界、专精于特定区域与国别的人才。区域国别学的任务是对世界各国、各地区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和探讨，帮助国人了解世界，为国家制定政策和开展各类涉外工作提供学术和智识支撑。因此，区域国别学与国家战略有着天然、不可分割的联系。当前，中美战略博弈形势严峻，俄乌、巴以、红海地缘冲突悬而未决，我国发展的整体外部环境

和特定区域的环境均趋于恶化，急需区域国别学建设为国家培养人才、建言献策。

区域国别学为国家战略提供了坚实支撑。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三大全球倡议在相关地区走深走实，国家战略对于区域国别学的需求越来越大，区域国别学为国家战略服务的路径也愈发明显。

提供智识产品。区域国别学服务国家战略的关键环节是要“知外”，即通过对特定地区和国家进行多维度分析，为国家战略制定者提供全面、深入的认知基础。例如，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开设了“全球智点”专栏，就是对全球各地区、主要国家多维度知识进行研究、传播、普及。可见，区域国别学可对特定区域、国别潜在政治、经济、安全等各类风险和机遇进行研判，尽可能精准把握国际形势。

塑造外交政策。区域国别学的深入研究，可以为制定灵活、务实的外交政策提供策略建议，助力国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保持主动。例如，为了落实国家教育规划和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2012年后，教育部在部分高校和研究机构启动了一批区域国别研究基地的遴选与培育工作。此类研究基地既具备传统的教育育人功能，还兼有咨政建言的智库功能，旨在服务国家外交战略。

引导经贸合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月发布的报告称，全球复苏进程平稳却缓慢，并且存在地区差异。“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我国周边国家就呈现“多速复苏”态势。区域国别学则可对各经济体结构、产业发展、市场规则等方面进行解析，服务于国家战略层面规划对外贸易、投资布局，进而达到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共赢合作的目的。

维护国家安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如中东地区国家国内政治、经济等状况并不稳定。此类域外安全问题与我国国家安全有着重大的联系，涉及能源安全、海外利益保护、经贸安全等方方面面。然而，如若不了解其他地区安全问题的来龙去脉，就难以更好地制定全面的、深入的、能够实践的国家安全战略。通过区域国别学，可以提高识别地缘政治风险、防范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概率，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提供决策参考。

国家战略为区域国别学发挥了引导作用。尽管区域国别学能为国家战略制定提供智识支撑等作用，但是实践中的知行偏差可能催生学术与政策之间的鸿沟。这就需要国家战略发挥对区域国别学的引导、推动作用，不断赋予区域国别学综合的、立体且多元的应用场景。

明确研究重点。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战略上指明了我国的世界视野，但在操作中需要一国一策，这就为区域国别学明确了研究重点区域、国别和方向。我国部分高校就开设了亚大概论、东南亚概论等课程，聚焦周边问题研究，培养致力于深化我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复合型人才。可见，国家战略的需求导向能够引导区域国别学聚焦关键地区、核心议题，确保学术研究与国家现实关切紧密对接。

激发创新活力。国家战略给区域国别学带来新的研究问题 and 应用场景，创造了新的发展可能。随着国家实力发展、技术进步，涌现出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此类新兴场景、模式，延展了国家战略设计所需关注的范

围。国家战略的新目标可以激发区域国别学在理论构建、方法创新、数据应用等方面的探索，提升学科的整体研究水平。

提供资源支持。国家战略的实施往往伴随对相关领域研究的政策扶持与资金投入，为区域国别学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2020年前后，国家留学基金委推出“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支持计划”，以服务国家对外开放大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需要为目的，选派、资助区域国别人才赴对象国进行学习、开展交流。该计划是典型的区域国别学计划，从政策、资金层面给予了大力支持。因此，国家战略所需，即可为区域国别学发展提供助力。

构建交流平台。区域国别学不能仅做案头工作，还需与研究对象保持全方位联系。这就要求区域国别学的学者、专家、研究人员搭建、利用与他国、域外各类交流平台和人脉网络。通过邀请各国国际关系研究所知名专家进行交流，不仅有助于增进国内对于域外区域、国别的了解，还提升了我国区域国别研究机构在国际上的知名度。

区域国别学与国家战略“互动共生”。“学用相生”贯穿中国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文化传统和历史经验之中，也构建了区域国别学与国家战略的逻辑关系。二者彼此支撑，催生“正增长效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区域国别学的作用更加突出，有着助力国家发展、协助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性任务。因此，促进区域国别学与国家战略深度融合、互动共生，无论是对提升国家治理能力，还是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皆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环视世界，‘全球南方’声势卓然壮大，为推动人类进步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球南方’应当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携手共进，走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前列。”作为人类进步事业中最能动的力量，“全球南方”在过去是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的中流砥柱，在当下肩负着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繁荣的历史使命，在未来将挺立在历史潮流前沿，推动世界走向和平、安全、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

“全球南方”的角色演变历史

“全球南方”自诞生至今，先后扮演着二战后的反殖“斗士”、冷战时的不结盟力量、新型全球化的主导力量、世界多极化的积极参与者等重要角色。

“全球南方”在世界殖民体系瓦解进程中，扮演着重要推动者角色。“全球南方”大多数国家遭受过帝国主义殖民掠夺，天生具有强烈的反殖诉求，希望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基于共同的利益，广大亚非拉国家逐渐联合起来，通过万隆会议、不结盟运动、《77个发展中国家联合宣言》、“三大洲会议”和《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等一系列合作，共同终结了延续几百年之久的西方殖民体系，建立了以主权独立国家为基础的现代国际体系。

“全球南方”坚持独立自主的政治底色，拒绝选边站队，成为冷战时期的不结盟力量。冷战爆发，刚获独立的“全球南方”国家，面临着被迫选边站队的压力和风险，国家主权安全受到强烈冲击。基于共同的安全诉求，不结盟运动创立，奉行独立、自主和非集团的宗旨和原则，反帝反殖反霸，主张加强南南合作，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不结盟运动逐渐发展成为冷战中维护国际公道正义的一股清流，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冷战结束后，“全球南方”把握住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大势，经济水平显著提升，成为推动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重要力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全球南方”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经济的比重于2008年超越发达经济体，于2023年提升到58.9%。时至今日，“全球南方”代表全球绝大多数人口，占世界经济总量半壁江山，推动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力量显著增强，“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正在从根本上重塑世界经济版图。

面对百年变局，“全球南方”不再是“沉默的大多数”，而是秉持中立立场，参与全球治理，成为真正多边主义兴起中的积极践行者。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全球南方”国家认清霸权国家强加思想和制度枷锁，深化对改变自身命运、追求变革进步的思考，以独立自主的姿态，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方，坚定支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深入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在2024年的不结盟运动峰会上，多国呼吁成员国加强团结协作，维护多边主义和“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利益。

“全球南方”的历史使命担当

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全球南方”要同呼吸、共命运，着眼于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大势，肩负起维护公道正义、促进发展振兴的历史使命。“全球南方”是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推动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分歧和争端，建设性参与国际地区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全球南方”秉持共同安全理念，坚持做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和平解决的推动力量。2024年3月，联合国安理会10个非常任理事国共同提出加沙停火决议草案，成为本轮巴以冲突以来首个通过的加沙停火决议；6月，非洲国家组成和平代表团，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尝试推动解决乌克兰危机。“全球南方”在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和平解决上的努力，展现了“全球南方”国家的责任与担当，为新形势下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

“全球南方”是开放发展的中坚力量，推动发展重回国际议程中心位置，深化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近年来，部分国家大搞“小院高墙”和“脱钩断链”，对全球发展进程形成严重冲击。金砖国家是“全球南方”的重要代表。金砖国家于2024年进行扩员，新的金砖十国经济实力雄厚，2023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比重为35.7%，超越七国集团的29%。金砖国家的扩容增强了“全球南方”争取发展权的能力，提高了推广南南合作、促进南北对话的水平，重新定义全球发展叙事，成为推动国际经济格局改革完善的重要力量。

“全球南方”是全球治理的建设力量，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全球治理架构更为均衡有效。当前，部分国家以意识形态为依据，大搞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导致全球信任赤字、治理赤字上升。“全球南方”以人类前途为怀，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积极打造全球公共产品，构建公正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在2023年“77国集团和中国”气候变化领导人峰会上，成员国呼吁加强“全球南方”国家的

『全球南方』的历史使命与担当

□ 刘恩东 王经民

团结与合作，为共筑“全球南方”命运共同体、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奠定了重要基础。

“全球南方”是文明互鉴的促进力量，增进世界各国不同文明沟通对话，加强治国理政交流。近年来，冷战思维回潮，“文明冲突论”和“文明优越论”沉渣泛起，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平添阻力。中国提出并坚持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举办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推动召开“良渚论坛”，证伪“西方中心论”，促进沿线国家文明对话、交流互鉴，引领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

“全球南方”的未来战略选择

历史和现实警示我们，追求独享安全、绝对安全行不通，各国必须共担维护和平责任，同走和平发展道路，才能真正实现和平安全的共同愿景。中国维护世界和平的决心不会变，将继续推动上合组织、亚信峰会、北京香山论坛、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等一系列国际安全交流对话机制的改革与完善，为“全球南方”提供平等对话与汇聚共识的平台。“全球南方”要利用好既有机制，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共赢而非零和的新型安全之路。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只有架起沟通的桥梁、铺就合作的坦途，才能汇聚共筑繁荣的动力，为各国人民增添繁荣发展的福祉。中国促进共同发展的决心不会变，将抓住共建“一带一路”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历史机遇，在不断扩大自身制度型开放的同时，统筹推进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的民生项目，不断增加与广大“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广度与深度。“全球南方”要顺应开放发展的时代潮流，以共建“一带一路”为重要合作平台，寻找相互间的利益契合点，加强合作，共谋发展繁荣、共享发展成果。

冷战结束30多年来，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全球南方”声势卓然壮大，世界加快走向多极化。中国捍卫公平正义的决心不会变，积极推动各方携手谱写多极化时代的人类文明进步新篇章。“全球南方”在新的国际形势下，要坚守初心，铭记万隆会议、不结盟运动等创立时确立的原则，继续加强南南、南北合作，进一步促进多边主义，全面尊重国际法和国际共识原则，坚决反对干涉他国内政的霸权行径，共同应对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方面的威胁和挑战。

各国的历史、文化和制度不尽相同，需要兼收并蓄、包容互鉴，方能实现共同进步，推动人类社会大发展、大繁荣。中国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决心不会变，将继续落实全球文明倡议，以尼山世界文明论坛、“良渚论坛”、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等平台为基础，坚定维护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和平等性，携手“全球南方”推动不同文明在平等交流、互学互鉴中交相辉映，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動力。

